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 1974 年 塞浦路斯战争

朱泉钢◎

【内容提要】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军队在政治发展、经济事务和安全议题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既有研究对土耳其军队在安全事务，尤其是战争中的作用关注不够。本文详细分析了土耳其军队在 1974 年塞浦路斯战争中的表现，探讨了军政关系对战争决策、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束的影响。相较于文官政府，土耳其军队在战争中具有主导性的地位，但军方与文官政府保持着良性的战略沟通与协作，这导致土耳其在战争中大获全胜。本研究既能加深人们对土耳其军政关系问题的认识，又能深化对军政关系与战争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 土耳其 军政关系 军政协调 塞浦路斯战争

【作者简介】 朱泉钢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和国际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土耳其军队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极其重大，军队的作用遍及政治发展、经济事务和安全议题。军队两次成功地直接发动军事政变，并两次间接导致政权更迭。长期以来，大多数关于土耳其军队的研究聚焦于土耳其军队持续的政治干预和近年来军队在政治中作用的下降，例如解释土耳其军队干政的原因，探讨土耳其军队干政的方式，评析土耳其军队干政的影响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土耳其军队的经

《土耳其研究》2018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第 63~77 页。

济行为问题。^①事实上,土耳其军队除了影响政治发展和经济事务之外,还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安全战略制定和安全政策执行。然而,学界对土耳其军队在外交政策和安全议题中的作用关注有限。^②一些研究可能涉及土耳其军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作用,或者探讨军方在有关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中的偏好,^③但是很少有研究系统地探讨土耳其军队在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作用。

土耳其军队虽然与国内的库尔德武装时常发生暴力冲突,但直接参与的对外战争并不多。除了出于加入西方阵营的考虑,派军参与朝鲜战争之外,1974年土耳其发动塞浦路斯战争是观察军队在战争中作用的重要案例。塞浦路斯战争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它不仅深刻变更了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国家发展进程,而且改变了东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的权力分配格局;另一方面,它还对冷战时期的联盟体系,美苏全球争霸的态势等造成重大影响。关于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问题的既有研究,主要关注英国、美国、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多方外交博弈,以及英国和美国国内的决策过程。^④但是,对希腊、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国内决策过程关注不足,对于土耳其军政关系影响战争的问题更是罕有研究。

本文主要对土耳其军队在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中的作用进行研究,

-
- ① 朱泉钢:《论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18年第2期,第66~86页; İsmet Akça, “The Conglomerate of the Turkish Military (OYAK) and the Dynamics of Turkish Capitalism,” in Elke Grawert, Zeinab Abul-Magd, eds., *Businessmen in Arms: How the Military and other Armed Groups Profit in the MENA Reg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 pp. 69–96。
- ② Risa A. Brooks, *Shaping Strategy: The Civil-military Politics of Strategic Assess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0。
- ③ Gareth Jenkins, *Context and Circumstance: The Turkish Military and Politic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7–59; İlhan Uzgel, “Between Praetorianism and Democracy: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Turkish Yearbook*, Vol. XXXIV, 2003。
- ④ Vassilis K. Fouskas, “Reflections on the Cyprus Issue and the Turkish Invasions of 1974,”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12, No. 3, Summer 2001, p. 126。

分析土耳其军政关系对塞浦路斯战争进程的影响，增加我们对军政关系影响安全事务的理解。

一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 1974 年安全决策程序

由于军队在土耳其国家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它在安全事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一方面，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安全决策模式不同。在欧美国家中，军队在安全事务中主要承担咨询建议文官领导、贯彻执行文官决策的职能。另一方面，土耳其也不同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军人政权。在阿拉伯军政府中，军队往往将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土耳其军队不仅将自己视为超党派的象征，而且在实践中也努力优先考虑国家利益。

通常来说，军队影响安全政策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军队与政府的实力对比与权限分配状况，二是军队与政府在相关议题上的政策分歧程度。^① 在 1974 年塞浦路斯危机中，土耳其军队在决策中作用重大，并且深刻影响着危机的进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军队在安全决策中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军队与政府在此议题上的偏好接近。

（一）土耳其军队在决策中的优先地位

长期以来，土耳其军方深受“色佛尔症候”^② 的困扰，因而极为关注国家安全。^③ 军队总是怀疑文官政府的能力和意图，尤其是在安全议题方面。军方认为，不能将关键的安全和外交政策议题托付给不可信的文官政

① 朱泉钢：《埃及军政分歧与第三次中东战争》，《军事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1 辑，第 38 页。

② 色佛尔症候：一战之后的 1920 年，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以瓜分、削弱奥斯曼帝国领土及国力为主要内容的《色佛尔条约》。《色佛尔条约》被土耳其人视为由于国力弱小而被列强欺侮的“创伤记忆”，并被凯末尔代表的军方发展为带有隐喻意义的“色佛尔症候”，即软弱的土耳其是无法维护自身安全的。

③ Hakan Yavuz, “Towards an Islamic Liberalism? The Nurcu Movement and Fethullah Güle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3, No. 4, Autumn 1999, p. 584.

治家，因为后者往往更加在意各自的党派和小团体利益，以及政治家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作为关涉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安全议题理应交给军队，因为军队是超越于日常政治事务之上的国家机构，是国家利益更为忠实的代表。^① 因此，军方坚持认为，国家安全议题应当超越政治利益，军队应当积极界定国家安全概念，参与国家安全决策，确保国家安全。

1974 年组建的土耳其联合政府相对碎片化，不能对军队形成有力制衡。1971 年 3 月，土耳其军队建立军人政权。1973 年 4 月，军方归还国家权力，同年 10 月 14 日，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埃杰维特领导的共和人民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了 450 席中的 185 席，虽然获得 1/3 的议席，但是离多数席位还差 41 席。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获得 149 席，埃尔巴坎的民族拯救党获得 48 席。显然，组建联合政府在所难免。事实上，军方更加偏好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样将使政府稳定。然而，军方的期待最终落空。1974 年 1 月 25 日，土耳其成立了共和人民党和民族拯救党联合政府。在新内阁中，埃杰维特出任总理，埃尔巴坎出任副总理，23 个内阁职位中，共和人民党占 17 个，民族拯救党占 6 个。^② 这届政府显然充满着政治机会主义，联合组阁的两党意识形态差异显著，共和人民党是世俗主义政党，而民族拯救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这种机会主义的组阁模式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因而无法对军队形成有效制衡。

在有关国家安全决策议题的制度安排中，军队具有优势地位。第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中，军方居于主导地位。1960 年军事政变，1961 年颁布新宪法，其中第 111 条规定建立国安委。该机构有 10 名成员，他们是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总统（大多具有军方背景）、总理、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和外交事务部长，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

① İlhan Uzgel, "Between Praetorianism and Democracy: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Turkish Yearbook*, Vol. XXXIV, 2003, p. 189.

② 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第 204 页。

令、海军总司令以及宪兵总司令,^①显然,具有军队背景的成员占有多数。该机构起初的职能是向部长委员会表达看法,并在国家安全决策中提供必要的基本指导。此外,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前,内阁有义务向国安委进行咨询。1971 年之后,其作用转变为向部长委员会提供建议。

第二,军队通过与其他国家官僚机构的日常沟通,影响国家安全决策。建国以来,土耳其国家机构的多数精英坚守凯末尔制定的国家发展目标,即成为一个现代的、西方的、欧洲的国家。虽然国安委设定了国家外交政策的战略方向,并且在诸如敏感的库尔德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上负有直接的执行责任,但是外交部在日常的外交政策事件中具有高度的自主性。^②外交部人员与军队同僚相互协作,双方交换情报,彼此磋商,以至于许多差别在相关文件提交给政府高层之前就得到了解决。

军队能够借助在社会中的大众支持,获得对政府的相对优势。军队的良好形象来自土耳其特殊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土耳其社会中主导的价值和态度强调军队的作用,并且将军队视为土耳其民族的核心要件之一。^③因此,军官能够借助社会尊荣,通过公开的批评、警告和抱怨某些国家政策和相关议题,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制定和执行。

(二) 土耳其军队与政府偏好接近

土耳其军队素来将自己视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当面临塞浦路斯可能被希腊兼并,以及塞浦路斯土族处于巨大威胁的状况下,土军势必持强硬立场。在文官政府方面,土耳其政治领导人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同时作为民选政府面临强大的国内社会压力,使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也持强硬立场。因而,军队与政府的偏好差别不大。

^① 郭长刚等编著《列国志·土耳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89页。

^② Gareth Jenkins, *Context and Circumstance: The Turkish Military and Politic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7-59.

^③ Metin Heper and Aylin Güney, "The Militar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The Recent Turkish Experience,"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26, No. 4, Summer 2000, p. 636.

土耳其军方将塞浦路斯视为具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国家，塞浦路斯危机可能带来的战略损失刺激军队持强硬的军事干预立场。对于塞浦路斯议题，军方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便一直极为重视。军方认为，土耳其的西部和南部岛屿不能被同一大国占领，尤其是不能被一个敌对的国家，例如希腊占领，因为这样将使军队面临两线作战压力。早在 60 年代，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和土耳其进行谈判的时候，就发现土耳其的谈判代表总是包括大量的军事专家和军官，他们一直强调土耳其需要在塞浦路斯获得一定的战略纵深进行军事防御。^① 1974 年 7 月 15 日，塞浦路斯突然爆发推翻马卡里奥斯政府的军事政变，塞浦路斯的土族领导和土耳其政府颇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权力分配将发生剧变，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族的地位将急剧下降，而希腊和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地位将迅速上升。^② 军方认为，该政变背后隐藏着希腊试图合并塞浦路斯的阴谋，这是土耳其军方万万不能接受的，因而，军队坚决要求对这一问题做出强硬回应。

埃杰维特和埃尔巴坎虽然在教俗关系方面南辕北辙，但是两人都是具有高度民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家。作为世俗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埃杰维特长期批评西方不公平地对待土耳其，他认为，土耳其在北约中承担的负担过重，并且过分依赖美国。两人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加入欧洲和与美国关系等议题上，都秉持高度的民族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土耳其应当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和国防体系；国家应当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努力与邻国构建符合土耳其利益的关系，而不是仅仅考虑北约利益，应当与邻国发展良好关系。^③ 最终，两位政治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了政府对于塞浦路斯议题的强硬态度。

① Vassilis K. Fouskas, "Uncomfortable Questions: Cyprus, October 1973 – August 1974,"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14, No. 1, 2005, p. 51.

② William Hal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1774 – 2000*,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 123.

③ Hasan Kösebalab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105.

土耳其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促使政府选择强硬立场。学界通常认为，由于领导人和选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容易产生观众成本。^①同时，这也意味着民主国家面临的民众压力更大。1973年，土耳其进行了恢复文官统治之后的大选，政治领导人意识到其政治命运和政权生存与民众支持密切相关。土耳其媒体表现出强烈支持军事干预的意向，左翼媒体《共和国》（*Cumhuriyet*）呼吁干预，要求恢复塞浦路斯的独立和宪法，保证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权利，彻底关闭希腊与塞浦路斯统一的大门。右翼媒体也批评英国和美国损害土耳其合法权益的举动，认为土耳其有权通过军事干预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②显然，国内民众的压力也迫使政府持强硬态度。

最终，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爆发的时候，军队在安全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不仅制约着土耳其内部的政策制定，而且影响着土耳其的对外谈判。此外，军政双方对此问题意见一致，均是持强硬立场，因而有助于土耳其战略的协调和执行，有助于土耳其军事行动的成功和更好地获取战略收益。

二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第一次军事干预

1974年发生在塞浦路斯的军事政变十分突然，土耳其的大多数军政高官都感到极为意外。土耳其国防部的塞浦路斯/希腊事务总干事（Director-General of the Cyprus/Greece Desk）巴鲁图（Eçmel Barutçu）是土耳其政府第一个收到政变消息的官员，他表现得极为震惊。埃希维特正准备离开安卡拉去往其他地区进行视察，外交部长祖尼斯（Turan Güneş）人在北京，土耳其驻希腊的大使在地中海的一艘游艇上，总参谋长也没在首都，而是身处伊斯坦布尔。^③土耳其面临当代最严重的危机，军政双方面

① 林民旺：《国内观众成本理论与国际合作》，《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第83页。

② Jan Asmussen, *Cyprus At War: Diplomacy and Conflict During the 1974 Crisis*, London: I. B. Tauris, 2008, p. 75.

③ Jan Asmussen, *Cyprus At War: Diplomacy and Conflict During the 1974 Crisis*, p. 32.

临严重压力，要在紧迫的危机下决策。

面对这场危机，土耳其需要迅速明晰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否进行回应？第二，如何进行回应？第三，能否确保回应成功？在这些问题的界定中，军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土耳其军方与强硬回应

长期以来，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有两大红线：一是防止希腊与塞岛统一，二是保护塞岛上土族民众的生命安全。^① 塞浦路斯局势的变化，以及希腊的态度让土耳其极为担心，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必须采取强硬立场应对此次危机。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及土耳其政府都认为，希腊将统一塞岛，土族民众将受到威胁，这严重触碰了土耳其的红线，因而需要回应。塞浦路斯副总统兼土族区主席登科塔什 (Rauf Denktaş) 在政变之后迅速与土耳其政府取得联系，他对塞岛上土族民众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表达了担忧。他称，政变之后，大量炮弹落到他的办公室屋顶，当得知政变导致马卡里斯政府被推翻之后，他意识到希腊接管了统治，土族人民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土耳其应当承担条约义务，对土族民众提供援助保护，而不是看着他们自生自灭。他的信息影响着土耳其方面对危机的看法，政变后不久，埃杰维特在接受一名记者的采访时指出，政变背后存在希腊兼并塞浦路斯的阴谋。他也向美国代表表示，希腊正在缓缓兼并塞岛。^② 1974 年，塞浦路斯土族人口不足 12 万，希腊族有 50 万人，希腊本土有 900 万人。如果合并，土族将仅占新国家人口的 1.3%，必然意味着土族在权力分配中地位下降，并逐渐被边缘化。

关于强硬回应塞浦路斯危机的决定，政府主要是与军方进行商议之后做出的。政变爆发的 7 月 15 日，埃杰维特在视察的飞机上曾透露：如果军

① Tozun Bahçeli, "Cyprus 1974: Turkey's Military Success Followed by Political Stalemate,"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5, No. 1, Winter 2014, p. 6.

② Mehmet Ali Birand, *30 Hot Days*, Nicosia: K. Rüstem & Brother, 1985, p. 2.

队能够做好准备，土耳其将进行军事干预。当天夜里，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他再次提到军队是否准备好的问题，总参谋长明确指出，干预依赖于政治决心，而不是军事能力。他称：“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但军方怀疑总理是否也已经准备好。”^① 此时，内阁也在进行讨论是否应当进行军事干预。16日凌晨1点，内阁成员收到国安委会议的干预决定通知。有部长抗议道：“你们直接做出决定，然后仅仅是告知我们，这样是否合适。”显然，总理关于强硬回应的决策主要是在征询军方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

此外，军方联合国内其他支持军事干预的力量，迫使那些对干预表示怀疑和反对的力量息声。当然，土耳其国内不乏对军事干预表示怀疑的声音。正义党领导人德米雷尔对大规模军事干预提出质疑，认为这可能导致国际社会认为土耳其是侵略者。前总理埃里姆也指出，美国可能支持塞浦路斯政变，因此军事干预可能受到美国的反制。^②

最终，由于军方在安全决策中的优势地位，土耳其在接下来的谈判和行动中，表现出反映军方意愿的强硬立场。

（二）土耳其军方与有限升级战略

与之前针对塞浦路斯问题采取的强制外交战略不同，1974年危机中，土耳其采取了以防御为基础的危机管理战略。^③ 为了支持军事干预，土耳其采取了有限升级战略。土耳其在进行积极备战的同时，并未放弃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

作为政治家，运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往往是优先选项。然而，土耳其外交人员的行动受到军队的支持和制约。军方担心谈判会延误不必要的时间，因而在政变当天的国安委会议上，土耳其军方领导人指出，仅仅会给

① Martin Austvoll Nome, "When do Commitment Problems not Cause War? Turkey and Cyprus, 1964 versus 1974,"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1, 2013, p. 63.

② Christopher Hitchens, "Uncorking the Genie: The Cyprus Question and Turkey's Military Rule," *MERIP Reports*, No. 122, March-April, 1984, p. 26.

③ Alexander L. George, eds., *Avoiding War: Problems of Crisis Manage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377 - 394.

予埃杰维特政府两天的外交时间。土耳其、希腊和英国、塞浦路斯的希族和土族在 1959 年签署《苏黎世 - 伦敦协定》，其中规定了土耳其、希腊和英国的保证国地位。7 月 17 日和 18 日，英国和土耳其代表在伦敦举行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会议，但是土耳其提出的恢复合法政府、撤出希腊军官、确保土族安全的三大要求并未得到希腊的积极回应，最终外交谈判无果而终。同时，英国也不同意联合干预，因此土耳其单边军事干预就成了优先选择。

军方意识到，如果推迟军事干预，未来成功的机会将下降。一方面，如果希腊与塞浦路斯完成合并，不仅将导致希腊在塞岛具有更强大的军事存在，威胁土耳其的南部安全，而且在土希之间关于爱琴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等争端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土耳其未来的军事行动将成本高昂。^① 另一方面，美国对塞岛政变表现出默认的态度，这引起了土耳其的担忧。由于 1973 年美国默认了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倒台，埃杰维特和共和人民党成员认为，美国可能会承认塞浦路斯通过政变建立的政府。如果美国承认该政府，土耳其军事干预将失去国际合法性，或者将被迫停止军事干预。^② 因而，应当迅速展开行动。

(三)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军事干预

在一定程度上，战争就像一场充满偶然性的赌博。^③ 赌博就意味着有代价，无论是对军队，还是对政府来讲，战争失败往往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土耳其军队的高制度化特征，以及在决策中的优势地位有助于军政双方的情报共享、战略协调，并能够确保军队的良好战斗力。

土耳其军政双方能够有效地分享情报和进行战略协调，有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孙子·谋攻》篇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见对自

① 黄民兴、谢立忱：《战后西亚国家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 290 ~ 291 页。

② Mehmet Ali Birand, *30 Hot Days*, Nicosia: K. Rüstem & Brother, 1985, pp. 4 - 5.

③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 40 ~ 41 页。

己、敌人的准确了解至关重要。首先，土耳其军政领导人对自身军事能力做出了准确评估。1964 年和 1967 年塞浦路斯危机中，土耳其军队既没有登陆塞岛的紧急预案，也缺乏进行登陆作战的两栖艇。而 1974 年，土耳其已经具备了登陆塞岛进行作战的武装能力，军事干预已经在土耳其军队的能力范围之内。并且，土军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登陆作战训练。在与文官政府的战略协调中，军方如实地表达了军队能在近期进行军事干预的状况。其次，土耳其军方对希腊军队和塞浦路斯希族的军事能力做出了准确评估。军事介入塞浦路斯，土耳其的首要敌人是塞浦路斯和希腊军队。准确判断他们的实力，是军事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塞浦路斯军队实力相对较弱，再加上政变之后大量清洗军官，因而其武装力量不足为惧。1923 年以后，希腊在爱琴海东部地区执行去军事化的政策，其军事存在相对较弱。再加上希腊军政府并未表现出积极备战的姿态，土军因此判断其武装干预应当不会受到太强大的抵抗。^① 开战之后的战事进展，证明土耳其军方判断的准确性。最后，通过政府的外交谈判，土方了解到英国和美国缺乏强烈制衡土军行动的意愿，这也为进行军事干预提供了强心剂。^② 英国和美国政府都认为，土耳其不会在近期内进行军事干预。再加上北约内部认为塞浦路斯议题对土耳其更加敏感，以及土耳其具有比希腊优先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英、美并未打算有力制衡土方行动。

土耳其军队的高制度化，以及协作型的军政关系有助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赢得战争的胜利。7 月 20 日拂晓，土耳其轰炸了塞浦路斯希族，出动 30 多艘运兵船和登陆艇，并且在驱逐舰的保护下运送了 6000 多名士兵、卡车和坦克到达塞浦路斯北部城市凯里尼亚（Kyrenia）。^③ 埃希维特宣布，出兵是为了和平而非战争，目的不是占领而是结束希腊人的入侵。

① Christopher Hitchens, "Uncorking the Genie: The Cyprus Question and Turkey's Military Rule," MERIP Reports, No. 122, March-April, 1984, p. 27.

② [美]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张志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第 458 页。

③ Brendan O'Malley and Ian Craig, *The Cyprus Conspiracy: America, Espionage and the Turkish Invasion*, New York: I. B. Tauris, 2001, p. 188.

土耳其军队按照既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行动。土军对军事干预做了长期的准备和训练，再加上其军队占据优势的军政关系特征不必受到政府干扰，因此在战争中表现良好。截至 22 日参与日内瓦谈判时，土耳其实现了获取桥头堡的既定目标，即在北部的凯里尼亚、尼科西亚 1/4 的土族地区，以及西北部的莱夫科地区之间建立一个土耳其军队控制的三角区域。

三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日内瓦谈判和第二次军事干预

土耳其参与日内瓦谈判是在军方同意下进行的，因为军方试图利用和谈的间隙，进一步巩固土军在塞浦路斯北部的据点，为第二次军事干预做准备。土耳其军方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外长祖尼斯在谈判中的强硬立场，并且制约了埃尔巴坎等政治家试图征服整个岛屿的野心。最终，土军在 8 月 14 ~ 16 日第二次军事干预塞浦路斯。

随着土耳其已经在塞浦路斯获得战略据点，它面临美国和英国的外部压力也日益增大，再加上希腊试图出兵塞浦路斯，土耳其决定参加日内瓦和谈。土耳其参与日内瓦会议，得到了军方的同意。军方意识到，它们已经占据了安全据点，因此可以有效应对希腊的威胁。谈判将为他们加强和巩固桥头堡提供时间，从而更好地进行第二阶段行动。^① 从谈判开始到 7 月底，土军在塞岛控制的土地扩大了一倍。事实上，土军已经占领了凯里尼亚到尼科西亚飞地的通道，控制了东西走向到北部岛屿的公路，切断了尼科西亚的供应线，包围了机场。^② 这些战略收益，有助于土耳其对占领土地的控制，也为下一阶段的行动奠定了基础。此外，谈判还能够缓解土耳其面临的国际压力。基辛格对埃杰维特参加和谈的举动给予了赞扬，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的调停收到了效果。

① Brendan O'Malley and Ian Craig, *The Cyprus Conspiracy: America, Espionage and the Turkish Invasion*, p. 200.

② Brendan O'Malley and Ian Craig, *The Cyprus Conspiracy: America, Espionage and the Turkish Invasion*, p. 203.

军方迫使埃尔巴坎等激进力量保持克制，缓解土耳其的国际压力。在土耳其国内，民众洋溢着军队干预成功的喜悦，埃杰维特一夜之间成为国家英雄，甚至被比作凯末尔。面对联合国的停火要求，联合政府的两党分歧加大。埃杰维特认为，土耳其原则上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有助于减轻外交压力，赢得军队要求的进行新的战略部署的时间。而埃尔巴坎则称，在真主的帮助下，土耳其实践征服的权利，因而不能轻易停止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分裂塞岛是永久解决塞浦路斯议题的唯一方式，土耳其不能接受只有形式上好处的解决方案。^① 危机一开始，土军的行动就相当谨慎。军方坚决将暴力冲突限定在塞岛内部，而不去扩展到希腊的领土。土耳其努力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保证国的责任和义务，并宣称自己是具有国际道义的危机管理者，这样不仅能降低土耳其的外部压力，而且符合军方的战略利益。^② 最终，国家总统和军队总参谋长要求埃尔巴坎降低调门。

军方的态度迫使埃杰维特政府和祖尼斯外长在谈判中极其强硬，因为妥协可能会面临军方强大的压力。土耳其政府的谈判能力受到军方的限制，政府领导人明显感受到了军队的压力，并且军方在国安委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军事胜利使军方处在成功的狂喜中，他们迫使总理必须坚持强硬立场，确保土军能够维持并加强在塞浦路斯不可逆转的存在。最终，祖尼斯在谈判中多次强调，他们无法轻易做出让步，因为国内舆论呼吁政府保持强硬，并且更为强大的压力来自军方要求政府不得做出任何重大让步。^③ 谈判中，祖尼斯坚持强硬立场，提出土耳其的诉求包括：希腊接受土耳其控制的塞岛土地，联合国紧急部队控制缓冲区，国际力量占领尼科西亚机场，谈判制定新宪法和成立两个自治政府。

面对土耳其咄咄逼人的谈判态势，以及土军持续地巩固和扩张占领区

-
- ① Fiona B. Adams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Turkey in the 1974 Cyprus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2, Summer 2001, p. 290.
- ② William Hale,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219.
- ③ Fiona B. Adams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Turkey in the 1974 Cyprus Crisis."

域，希腊政府逐渐明白，土耳其并非真正打算通过谈判解决争端。8月8日，第二轮日内瓦和谈会议召开。此次会议充满了憎恨和相互指责，希、土两国都谴责对方并未遵守停火协议。土方指出，应当在塞浦路斯建立两个自治政府组成的联邦，土族应占据30%的领土，拥有独立武装，从而具有经济自给能力和军事自保能力。如果无法组建联邦，土耳其将诉诸战争。土耳其的强硬立场并未受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土耳其在国内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埃杰维特和军队高层领导进行了一场7小时的会议，主要是谈论新的干预计划。当美国意识到土耳其正在进行战前决策时，基辛格向埃杰维特提出新的方案，但埃杰维特表示，他没法控制军队，军方不可能等待进行新的谈判。^① 最终，土耳其进行第二次军事干预。

8月14日，土耳其再次进攻塞浦路斯。希腊想要行动，但是军政府缺乏能力，而美国不愿制衡土耳其。8月16日早些时候，土耳其宣布停火。土耳其已经实现了既定目标，沿西北的莱福卡（Lefka）经尼科西亚到东南部的珐玛古斯塔一线划界。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土军不再继续前进。至此，土耳其的塞浦路斯战争基本结束。

四 结语

作为具有暴力强制能力的国家机构，军队在一国的对外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是战争绝不仅仅是政府主导的。在不同国家，军政关系的差异影响战争决策、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束。1974年土耳其发动塞浦路斯战争之前，军队在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府充分考虑军方的意愿，而军方也尊重政府的外交努力。充分的制度沟通，导致土耳其做出了良好的战前评估。最终，双方在通过军事干预实现战略目标方面达成共识。在战争中，土耳其军队既表现出专业性，也表现出适当的主

^① Brendan O'Malley and Ian Craig, *The Cyprus Conspiracy: America, Espionage and the Turkish Invasion*, p. 213.

动性，这是土耳其在战争中获胜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虽然反映了土耳其军方的意愿和能力，但军方重视与文官政府的战略沟通协调，这最终导致了土耳其实现了良好的战略结果。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of Turkey and the 1974 Cyprus War

Zhu Quanga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e milita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 affairs, and security issues.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ha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security matters, especially in w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tivity of the Turkish military in the 1974 Cyprus War, and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on war decision-making, the war process and the end of war. Compared with the civilian government, the Turkish military ha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war, but the military and the civilian government maintain a e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hich led to Turkey's victory in the war. This research can not only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of Turkey, but also widen the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war.

Keywords: Turkey;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ivil-military coordination; Cyprus war

Author Profile: Zhu Quangang is a research assistant at the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iddle East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